



国外青年文化
研究译丛

青年、流行文化与道德恐慌

从下等戏院到匪帮说唱，1830-1996

Youth, Popular Culture and Moral Panics

Penny Gaffs to Gangsta-Rap, 1830-1996



[英] 约翰·斯普林霍尔 著

王华 孔潭 骆益 译

王华 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流行文化 与道德恐慌

从下等戏院到匪帮说唱，1830-1996

Youth, Popular Culture and Moral Panics

Penny Gaffs to Gangsta-Rap, 1830-1996

[英] 约翰·斯普林霍尔 著

王华 孔潭 骆益 译

王华 校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流行文化与道德恐慌 / (英) 约翰·斯普林霍尔著; 王华, 骆益, 孔潭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8.6

书名原文: Youth, Popular Culture and Moral Panics Penny Gaffs to Gangsta-Rap, 1830–1996

ISBN 978-7-5153-5139-1

I. ①青… II. ①约… ②王… ③骆… ④孔… III. ①青年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116822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01-2018-0311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中国青年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责任编辑: 彭 岩 刘晓宇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07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243千字

印数: 1—3000册

版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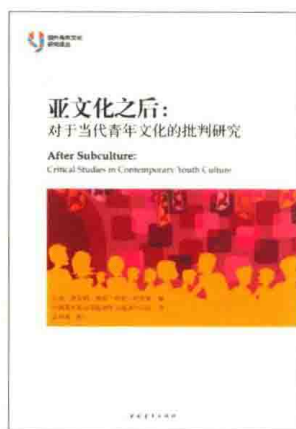
定价: 4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内容提要

本书集中探讨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绵延不绝的所谓“道德恐慌”。为什么某些特定的流行娱乐形式会突然激发起公众的关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认为它们与犯罪有关？作者将分析与评论置于青年流行文化的背景之下，从19世纪人们对于流行娱乐形式带给“下层阶级的孩子们”不良影响的焦虑中发掘其根源。纵观历史，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此类“道德恐慌”不断地在英国和美国被延续和重现。人们一直试图将社会和道德崩塌的责任转嫁于各种流行娱乐形式：下等戏院、“廉价惊险小说”、“一角钱小说”、黑帮电影、“恐怖”漫画、“恐怖录像”、电视暴力、“匪帮说唱”、电脑游戏。所有这些都成了“民间恶魔”，而“民间恶魔”就一定会引发犯罪。本书认为，所谓流行文化会引发青少年不良行为乃至犯罪的“道德恐慌”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作为制造恐慌的主体，成年人所真正焦虑的并不是青少年错误行为的本质，而是自身对未来和技术变革的恐惧。



亚文化之后：
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



通过仪式抵抗：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青年文化比较：
青年文化社会学及美国、英国
和加拿大的青年亚文化

责任编辑：彭 岩 刘晓宇

书籍设计：瞿中华



国外青年文化研究译丛

主 编：孟登迎

学术顾问：陶东风 金惠敏 汪民安 吴鲁平 陆玉林

译丛总序

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

——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多重视野

孟登迎

“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通常指青少年(adolescents 和 teenagers)将自身从父母所属的成人文化社群当中分离出来的种种方式。正是由于青年文化具有这种与成人社会相区别的特征,人们在认识青年文化现象的时候,一般都将其纳入各类青年亚文化群体(youth subcultures)当中来进行。从这一点来说,研究和探讨青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研究和探讨“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青年亚文化这一概念更能突显青年有意识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保持区分的抵抗意识,更能体现青年的一些具体行为表现形态和文化政治诉求,被广泛用于社会学、犯罪学、伦理学、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传媒研究等诸多领域。

“青年亚文化”作为一个复合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和“亚文化”概念均有直接关联。因此,对于“青年亚文化”的讨论可以从考察“青年”和“亚文化”的形成入手。“青年”和“亚文化”作为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学术领域的基本概念,虽然在形成和出现方面有不同的语义内涵和社会阶层区分意义,但却有着共通的现代性背景。从概念范畴上看,“青年”和“亚文化”都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才出现的新词语,并最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人群区分意义和政治文化内涵。

“青年文化”的发现史

法国历史学家菲立普·阿利耶斯(Philippe Ariès)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语源学考察,发现18世纪以前的“人们还没有我们今天称之为青春期(adolescence)的观念”,他们对“童年”(childhood)、“青少年”(adolescent)和“青年”(youth)尚未进行明晰的区分。^①我们今天一般主要以能否独立

^①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Robert Baldi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2, p.29.

生活作为区分“青年”和“青少年”的标准,而在前工业社会时期,“青年”这一概念的所指本身是不清晰的,它仅指一个时限不确定的持续年龄段。它可以指10多岁,也可指20多岁的人。由于尚未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和核心家庭,没有“青春期”这一过渡阶段的观念,就出现了不少“小大人”(young adulthood):即在做工、穿着、交往等方面被成人化了的儿童或青少年。^①这意味着,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年轻人,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年轻人的看法却很可能大相径庭。

年轻人能够成长为真正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能被当作“青年”来看待,一般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出现的新事情。美国学者约翰·吉利斯(John R. Gillis)等人的研究表明,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现代“青年”概念,大约是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它本身就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产物。^②与此相比,18世纪晚期的两位伟大的欧洲作家——卢梭和歌德,则在他们的文学著作中生动描绘了青春期特有的情感骚动,表达了他们对于青春风暴的浪漫想象。这些表达在很大程度上突显了成人对于青春烦恼和青春易逝的敏锐感受,以丰沛的情感表达方式体现着那个时代对于青春的理解。

到18世纪末,经济和政治的剧烈动荡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的青年观念。工业革命引发了一场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迁徙,开辟了一个建立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规模生产基础之上的新社会。青年和儿童进入陌生拥挤的城市,以前所依附的工作、邻里和家庭的传统结构被破坏,作为苦力和劳工的青年和童工形象出现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人的作品中。^③而1793年法国议会通过的新《人权宣言》更是明确宣告:“任何一代人不得迫使其后代隶属于他。”这表明政治上的剧烈变革(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进一步为青年人获得激进的平等权创造了合法条件。但是,青少年随父母进城务工而大量迁移或移居大城市,或者从一开始就诞生并成长在城市的边缘阴暗地带,也滋生了大量的青少年犯罪行为。这些

① John R.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p.5-7.

② John R.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 p.38.

③ Jon Savage, *Teenage: The Prehistory of Youth Culture: 1875-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7, p.13.

越轨男孩大多来自移民家庭或贫民家庭,充满着一种无法自控的情绪暴动,直接威胁到成人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影响到人们对于未来一代的看法。

1899年,专门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的“青少年法庭”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设立,由此迈开了人们将青春期看作生命中一个独立阶段的关键一步。针对更多的无法接受全日制学校教育或在学校教育中被放任的青少年,政府和一些帮教人士开始创办更多的教育和教化机构,争取让绝大多数青少年能接受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延缓了少年的成人化进程,客观上为青春发育期(puberty)设定了一个“半独立”的生命阶段。如何理解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必经的这个特殊的过渡期,成了摆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学术使命。

1904年,遗传心理学家 G. 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 1844 — 1924)积十多年心血准备、花五年时间完成的《青春期:心理状态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和教育的关系》(*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一书出版,为人类重新认识青少年必经的这段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阶段提供了里程碑式的解释。霍尔将青春期锁定在14—24岁这段从青春期萌动到成年期形成的独立过渡期,并宣告“青春期是一次新生”。在他看来,青春期是个体对青春发育期当中或之后自身出现的各种生理的和心理的变化的一种自然响应。在向成人期的最终状态过渡时,青少年必将在身心方面表现出混乱、创伤、突变和恐慌等特征。他同时认为,青春期充满活力且一去不返,需要特殊的庇护,需要一点安逸和懒散,当然也需要浪漫和理想。学校应该让青年人在青春期获得最完美的发展,教育者应该从心灵深处点燃青春之火,青春期应受到同情、欣赏和尊重。^①

G. 斯坦利·霍尔对于青春期的阐发,不只在心理学界,而且在社会学领域和商业主导的大众传媒出版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热潮。自20世纪20年代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就率先对移民中的犯罪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展开了系统的研究。据加拿大学者迈克尔·布雷克(Michael Brake)的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青年和青少年问题已经成为

① 转引自 Jon Savage, *Teenage: The Prehistory of Youth Culture: 1875-1945*, pp.70-72.

美国社会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193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在耶鲁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将讨论主题留给青年问题就明确显示了这一学术动向。社会学家 E.B. 路透(E.B. Reuter)于1936年和1937年分别发表了《青少年的世界》和《青少年社会学》两篇论文,提出青少年生活在一个不同于成年人的世界,并创造了一种脱离于成人社会的包容性的社会秩序。而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随后也提到青年人有他们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态。^①需要补充的是,这类认为青春期的特殊阶段的观点在当时的美国也遭到了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早在1928年,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一书当中,就通过对正值青春期的萨摩亚少女的性行为和当地家庭风俗的讨论,批评了美国社会对待青少年的这种流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E.B. 路透也强调有一种独立的青春期文化,但他对美国思想界受 G. 斯坦利·霍尔影响而普遍接受的如下观念——青春期是充满“风暴和压力”、充满情感混乱和骚动的第二人生阶段,具有明显的个体精神焦虑和社会失序特征——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种流行观念对青春期出现的各种剧烈的变化进行了戏剧化、夸张化的描绘(比如通俗文学文本或连环画都想当然地、以大人的设想来展现孩子们厌学的情态),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发现有些孩子在经历青春期的时候过渡得相当自然,并没有出现多少困惑和混乱。并进而指出,生理的和社会的现象之间没有固定的时间联系,青春期的社会行为与性成熟关系也不直接,而与文化的作用有较大关系;同时,青年的行为特征与青年所属的群体也有密切关系,它取决于许多具体的因素。他甚至认为,现代恶化的都市社会没有给青年人提供可供他们与朋辈共担重大责任和相互交流的真实空间,使他们被迫处在一种寄生处境当中。由于缺乏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机会,青年们转向体育运动和其他好动的形式和扰乱性的行为。^②E.B. 路透实际上注意到了影响青春期行为的文化传统、文化群体(阶层)、教育体系和劳动

① Michael Brake, *Comparative Youth Culture: the sociology of youth cultures in America, Britain and Canada*, London: Routledge 1995(c1985), p.39.

② E. B. Reuter, 'The Sociology of Adolesc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3, No. 3 (Nov., 1937), pp. 414-418.

法等因素,为研究独立的青春期文化提供了更多样的社会政治维度。

不难看出,关于独立的青春期文化的观念已经产生了,但这种文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特征因何生成,其实是一个需要落实到社会学层面来解释的具体问题。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 — 1979)在1942年生造了“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一概念,他试图用这一概念来进一步阐释青春期文化的问题。^①他发现,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青少年大都热衷于与异性的社交,沉浸于消费和享乐(“玩得爽”)而不想担负社会责任;男孩尤其注重展现自己作为“酷哥”(swell guy)的健美形体和性魅力,女孩尤其关注自己能否被称为“美眉”(glamor girl)。由这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所建构的青年文化,不但涉及青少年受教育的过程和年龄问题,更关系到从童年期的依赖性向成年期的独立性如何过渡的问题。在帕森斯看来,“青年阶段是一个有很大压力和不安全感的阶段……青年文化在这一阶段中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减缓从性别定型的家庭童年期向婚姻、职业中的完全成年期过渡时产生的紧张感和不安全感”。^②帕森斯用“青年文化”来概括年龄和性别角色在青春期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注意到了代际关系、家庭角色、职业选择和社会责任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于青年生活方式、行为和角色认同的影响。显然,这个新创的“青年文化”概念扩展了观察青年社会文化交往的范围,有助于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参与的各种带有社会文化色彩的活动(如投票、性行为、抽烟、喝酒和驾车等)进行社会文化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帕森斯这里所说“青年文化”,基本上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的事情,广大的工人阶级青年和出身边缘群体的青年其实并不在他的观察视野当中。因为,后者更难以成功实现所谓的年龄和性别角色的过渡,而经常会用逃学甚至犯罪来反抗学校和秩序。对于这些移民阶层(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帕森斯的学生艾伯特·科恩(Albert K. Cohen)以及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来完成的。

① Talcott Parsons, 'Age and Sex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 Parsons, ed.,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 p.91.

② TalcottParsons, 'Age and Sex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p.101.

芝加哥学派及美国社会学界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作为最早对亚文化群体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对移民、犯罪青少年等亚文化群体展开了研究。经过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芝加哥学派贡献了一系列研究“越轨亚文化”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杰出成果。

芝加哥学派早期领军人物之一罗伯特·E. 帕克(Robert E. Park, 1864 — 1944)于1915年所写的《城市》一文,就开始注意现代城市社会当中各种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从1921 ~ 1931年间,帕克指导自己的博士研究生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者、青少年犯罪者以及犹太移民等。他们要考察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与调控关系,考察他们的交际和隔离、休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帕克鼓励他的学生们深入各类娱乐(职业)场所,以“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去考察“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他们最终发现,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结构和道德秩序正逐渐解体,对新的都市人际关系已经失去了约束力。而对于新出现的各类职业和各类边缘群体,传统规范和社群关系无法实施必要的规约和监督;由此,导致了大量越轨亚文化行为和越轨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尤其以移民家庭的青少年为甚。帕克以“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理论来解释都市亚文化社群产生的根源,为研究亚文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①帕克和他的学生们开创了美国社会学关注边缘群体的现实调研传统,将移民越轨青少年和下层劳工(如出租车舞女)等非主流人群纳入正式的社会学研究。可以说,“青年亚文化”概念的逐渐形成和正式提出,与芝加哥学派关注边缘“越轨”青年群体的学术努力有着直接的联系。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米尔顿·戈登(Milton M. Gordon, 1918 —)大概是第一位自觉考察“sub-culture”一词的构成及其意义变化的社会学家。他在1947年发表的“亚文化概念及其应用”一文中,将“亚文化”概念的出现追溯到1944年在纽约出版的《社会学词典》(*Dictionary of Sociology*)

① Ken Gelder & Sarah Thornton,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23-25.

所收录的“culture-sub-area”一词。他发现该词与“亚文化”非常相近,指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区域当中那些有独特而完整的文化特征的亚区域(sub-division),尤其比较强调这些特征在地域和物理方面的接近性。^①戈登还发现,另一位学者阿诺德·格林(Arnold W. Green)在1946年也使用过“highly organized subcultures”这一表述,字面意思是“高度组织化的各类亚文化群体”,用以讨论个体在现代社会所承受的种种人群区隔(population segment,如性别、年龄、阶级、职业、宗教和种族团体)以及这种区隔所导致的精神困惑问题。在戈登看来,格林在“人群区隔”意义上所使用的“亚文化”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敏锐而深刻的工具,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各种文化环境因素(阶级地位、种族背景、地域的和乡下或城市的住处、宗教归属等),认识这些因素之间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②

到了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研究学者艾伯特·科恩(Albert K. Cohen, 1918 —)在其著名的《越轨男孩: 帮伙文化》(*Delinquency Boys: the Culture of Gang*)一书当中,专辟“亚文化概论”一章阐述他的亚文化观念,并从理论层面来深入探讨越轨青少年亚文化现象。科恩能够较为系统地探讨青年亚文化问题,得益于他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理论(假设):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试图解决自己在社会中遭遇的各类麻烦问题。在他看来,下层阶级出身的青少年所面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地位挫败(status frustration)带来的苦恼,而这些青少年形成的亚文化就是他们解决地位挫败问题的特有方式。科恩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以物质成功、个人实现为目标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而这种价值观和评判标准最终将出身于下层阶级的青少年排斥到了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一些孩子由于无法满足体面社会阶级地位体系的标准,他们的地位就被体面社会所否定。越轨亚文化通过向下层孩子提供他们可以适应的地位标准来应对以上这些被排斥的问题。”^③这些处在边缘社会的青少年与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存在

① Ken Gelder & Sarah Thornton,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p.43.

② Ken Gelder & Sarah Thornton,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p.41.

③ Albert K. Cohen, *Delinquency Boys: the culture of ga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p.121.

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他们无法融入那些能够适应中产阶级竞争规则的青少年,开始以他们自身处境结成的帮伙作为文化归属群体。最终,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一套与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价值体系,后者成为越轨亚文化群体产生的观念支柱。因此,他认为青少年亚文化——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文化,就是越轨青少年群体对主流体面社会的反叛性回应。

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 1928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继承该学派关注“越轨人群”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他对功能主义的越轨行为理论(即认为越轨行为是由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提出了质疑,并在《局外人:越轨社会学研究》(*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1963)一书中提出了“贴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人群互动的产物:越轨行为和越轨人群不是天生就有的,“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尤其是由强势人群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违反它们就构成了越轨行为,并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局外人的特殊个体。根据这种观点,越轨的根据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冒犯者’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着重号为原著作者所加)。^①贝克尔这种不无极端色彩的表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亚文化偏差行为的某些社会成因,尤其强调了“越轨亚文化”被命名、被标签化、被刻板定型的社会阶层根源。这种揭示不但体现出了社会学的人文情怀——社会学家对于弱势群体和越轨人群的同情,而且在方法论上对后来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尤其涉及主流意识形态或传媒对青年反叛群体的舆论定型时)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学者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正是受到“贴标签理论”启发,研究了英国主流传媒对于两类青年亚文化反叛群体(摩登族和摇滚派)的“妖魔化”描绘,于1972年出版了《民间恶魔(公害)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一书,揭示了青年亚文化群体被贴上的“民间恶魔(公害)”这一标签与成

① Howard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9.

人主流社会“道德恐慌”之间的深层联系。斯坦利·科恩的独到见解促使媒体从业者和青少年文化研究者去反省：反叛青少年到底有没有像我们所描绘得那么恐怖，成人社会是不是在“制造”恐慌和反叛者？

1970年，约翰·欧文(John Irwin)结合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美国文化语境，再次对“亚文化”概念进行了扩充和修正。他指出，这一概念已经不再仅仅指某个具体的社会团体，还可以指某种显在的生活方式、行为体系、社交空间和共享的观点。^①这一强调对于研究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象征意义，对于将符号学带入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帮助。

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以及美国其他社会学家对于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研究，实际上为青年亚文化概念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他们从城市迁移、偏离和“生活圈”角度来描画亚文化身份，通常以经验主义的和民族志学的方法去接近青年亚文化群体。在他们那里，亚文化身份是由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因此与那些处于弱势或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有紧密关联。从这一点来说，芝加哥学派对于亚文化的这种界定，的确为考察边缘群体的亚文化行为（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探讨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时，芝加哥学派也暴露出较为明显的理论缺陷，即更多地看到了笼统的结构对于个体的强大塑造力量，而对边缘群体的主动反抗以及这种反抗的多样化表现并未作更深入的文化政治分析。

到了伯明翰学派，才明确将“阶级”维度引入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当中，并且开始重视青年亚文化实践的“仪式抵抗”意义。这一转变，至少在理论阐释层面极大地释放了各种青年亚文化风格的丰富政治文化内涵和活力。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该校1964年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简称 CCCS)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

① Ken Gelder & Sarah Thornton,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pp.67-68.

化研究事业(Cultural Studies),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伯明翰学派。^①他们不但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重大突破,而且极大地扩展了研究领域,在流行文化、亚文化、教育、种族、劳动就业和妇女研究等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对于青年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该研究综合调动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多重理论视角,从更深的社会政治语境当中去分析各类青年亚文化行为的符号象征(风格)意义——尤其是“仪式抵抗”蕴含的政治实践意义。

伯明翰学派除了借鉴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比如,关注越轨亚文化群体、“贴标签理论”和“问题解决”理论等)之外,尤其继承了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开创的从社会历史语境分析文化现象的“文化与社会”的学术传统。在伯明翰学派的主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看来,要谈“亚文化”先得划定“文化”概念的范围。而依据雷蒙·威廉斯从“社会”角度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或学识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而且表达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②霍尔对此定义做了进一步推进,认为“文化”概念有其明确的实践和物质指向,指的是“社会群体形成自己独特生活模式,并且给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赋予表现形式的一个社会层面……‘文化’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和形态去实现或具体展现群体生活的一种实践”。^③不难发现,霍尔等人更强调文化所包含的那些有意味的符号化表现形式,这一点与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夸张化、仪式化的行为举止表现更为切合。

① 尽管20世纪70年代曾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担当核心领导角色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到1990年还否认存在“伯明翰学派”,但这个机构培养研究生的独特方式(学生小组讨论自主研究)、共享的左派理论视角(阶级、年龄、种族、性别、殖民关系等)和培养出的20多位知名学者,都足以证明以它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实践确实具备了学派特征。参见: 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 Vol. 53 (Summer, 1990), The MIT Press, p. 11.

②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p.57.

③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4.